

“唐风宋韵”在松阳

唐宋时期松阳的教育(之二)

南州书院。南州,原名“沙溪”,所以得名“南州”,缘自南宋著名的理学家、思想家、哲学家、教育家、诗人、闽学派的代表人物朱熹。宋淳熙间(1174~1189),偶于一次来松阳讲学时,乘船途经南州,不禁被耳边传来朗朗书声所吸引,于是弃船登岸,步入南州村,沿着山坡小路,顺着书声,便到了书院之所福安寺(建于梁朝502~557),巧遇常来书院讲课的王光祖。王光祖,字文季,官大理评事,精于理学,松阳人。王见朱熹来访,拱立相迎,规掌如太极状,引入僧舍。朱熹开始感到有点奇怪,但很快明白此人并非等闲之辈,脱口曰“王子(指王光祖)胸中自有太极”。两人交谈甚欢,交谈中论及朱熹近期所作《四书集注·中庸章句》的注释时,王对其中“不使其滋长于隐微之中”句,提出自己的见解:当在“滋长”“于隐微”之间加“潜暗”二字,朱熹深然之,视为知己。无独有偶,巧事也成双,南州当地塾师徐公也正在为学生教读《中庸·章句》,闻知朱熹到来,惊喜万分,整衣恭迎,接入自家徐姓故宅,交谈如故。交谈中,对《中庸·章句》也提出了在“滋长”“于隐微”之间加“潜暗”二字的见解。又《南州徐氏宗谱·卷一》载,南州人徐绍芬(1828~1885)撰《南州地名说》中说,塾师徐公提出对“不使其滋长于隐微之中”句,应在“滋”前加“潜”字,“长”前加“暗”字。朱熹也觉得“潜滋暗长”四字添注甚好。朱熹深表赞同之余,却感松阳人才辈出,如此辟野山村也是卧虎藏龙,在这里好像见到了南昌之南州徐穉(字孺子),今在此地也有名士出乎其间,遂亲书“孺子别里”匾额,以此地名曰“南州”。

高人相聚,雅兴未已,不觉日已西坠,当夜朱熹留宿南州福安寺。此后,王光祖与朱熹常有书信来往,其中一首《答朱晦庵》,收录于《朱熹年谱长编》,诗曰:

尺纸书来训诲深,孔门希瑟孰知音。
一经题品便佳士,万有感荣铭此心。
善利几当严界限,日新功在惜光阴。
个中受用为真实,敢把工夫向外寻。

南州徐氏后裔子孙也为纪念朱文公建亭,将朱文公手翰刻于额石,名曰“孺子亭”,以冀流传后世。惜已久废。

南州村坐落城南三十里的松阴溪畔,是古时通往处州府的水路必经之地。清代村人徐绍芬形容为“村前环水如玉带,后绕青山如金城”。南州书院处于如此幽美的自然环境中,必然引起不少当时名流学者前来学术交流,开课讲学;各地前来求学的学子也因之受益匪浅。从朱熹被朗朗的书声所吸引,以及王光祖、塾师徐公都能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见解,可见这种互学互长的学习氛围在当时的松阳盛兴一时。福安寺,经清咸丰五年(1855)修缮后至今犹存,殿宇三进五开间,两侧有附屋及



福安寺

园子,占地面积有1000平方米之多。宣统元年(1909),曾辟为南州初级小学校。20世纪50年代后,福安寺后殿被改建为砖木结构的平房,曾用于设立小学、初中。至今整体结构保存完整。

城西书院。创立者叶八,卯山始祖叶俭三十一世孙。宋贡生,推升大理寺评事。八公因祖清臣仕居湖州,家仅严父佳禾公告养居家,佳禾升逝后,公遂无志仕途。时有松邑城人,以八公才学兼长,品行端方,而邀请设帐,公乃乐从。遂回归故里,选择西屏山之侧,城西之地,购置屋宇,既为住宅,也作书院。叶八亲掌书院,招徒训课。其子孙也因之在此聚族而居。据《城西叶氏宗谱·祠堂志》载,叶八第十一世孙亨宗,于元延祐元年(1314)捐献故宅帮助改建“东琳宫”,而以内堂右侧立祠以祀祖先。由此可见,当时的城西书院,其规模也不一般,可惜书院办学时间太短,其子孙未能传承。

叶震明善书院。叶震,松阳古市人,隐居教授于家塾。宋淳熙九年(1182),朱熹(朱文公)提举浙东常平使,行郡县修举振荒事至松阳,震执所业晋见,熹与语而有契,为讲《论语》《孟子》,留旬日乃去。尔后,叶震将其家塾拓充之,建礼殿讲堂,及门庑斋庐之属以为书院,额曰“明善”,用为乡人肄业之所。而岁更世易,至宋末元初,叶震开办的“明善”书院,未满百岁,也是院宇尽废。

叶再遇明善书院。叶再遇,古市人,据叶世钧《松阳卯山·叶姓发祥地》载,再遇为俭公第四十一世孙,为必达公系下,少从军,江淮立功,升淮安安抚使,殿前步帅。居镇江。宋咸淳间(1265~1274),叶再遇为纪念朱文公来古市讲经论道,请建书院以祀文公。与此同时,捐出自己的舍宅用以开办书院,取名曰“明善”,以教化乡人。至元十一年(1274),因萧子登将祖先创立的“萧院”重加修整复建,改为明善书院(即第一明善书院),其规模比叶再遇的“明善”书院更胜一筹,叶再遇的“明善”书院渐行消退,名存实废。

六、教育兴盛的原因

松阳县学在唐武德四年(621)创设时,学额16名。宋代,县学发展,学额增至30名,由于经费所限,不一定满额。关于两宋松阳县学学额的情况,松阳旧县志记载的寥寥无几,但前句所载情况,也许能作如下解读:

其一,增加学额的时间,当在北宋徽宗崇宁三年(1104),或之后的一两年间。因为史料确记,自熙宁后,州县开始大规模兴学,并开始实行三舍法,由县学生选考升入州学,州学生可以贡入太学。崇宁三年确定:“增县学弟子员,大县五十人、中县四十人、小县三十人。”那么,在此之前,松阳县学的学额是多少,甚至县学是否一直在延续呢?对这一问题,只能推测了。唐朝灭亡当年(907),钱镠在两浙之地建吴越国,松阳为吴越国属县。唐末五代时期,藩镇割据,战乱频仍,钱镠采取保境安民和“休兵息民”的战略方针。其继任者(吴越国历三代五王,至公元978年钱弘俶纳土归宋,立国72年)一直秉承这一方针,

使两浙之地有一个较长的稳定发展时期。所以,松阳唐宋660多年间,一直比较安宁,因而县学亦一直比较平稳地延续着,在增加学额之前,可能一直是16名。

其二,500多年的相对和平发展后,从仅限30个学额及经费之窘,可见当时松阳社会的发展还是落后于那个时代。究其原因,责任应由松阳四围的大山来背。不过,崇宁后不久,松阳的教育真正出现了腾飞。从北宋嘉祐辛丑(1061)科松阳籍学生叶仲、叶仲询两人率先登进士,到政和戊戌(1118)科杨跻、叶询武同时中进士止,短短57年间,就有14位松阳籍人士考中进士。这虽然与当时的强县不能相比,与自身比一比却是很大的进步——可见此时松阳的教育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。

到了南宋时期,赵家王朝偏安于秦岭淮河以南,全国经济重心完成了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历史性转移,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发展中具有路标性意义的重大转折。南宋也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繁荣、科技进步、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王朝。其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颇有成就,尤其在思想文化方面,南宋对后世影响之深,更是远超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。

南宋时期,取士更是不受出身门第的限制,只要不是重刑罪犯,即使是工商、杂类、僧道、农民,甚至是杀猪宰牛的屠户,都可以应试授官,因此,南宋的科举登第者更多的是平民。

这一时期,已经完全确立了正统的儒家道德取向和核心价值观。南宋政府通过各种渠道和各种社会力量,将其传播到民间,既接地气又不留死角。各级学校学的是《四书》《五经》,科举考试的内容也离不开《四书》《五经》。州县官到任后,必将修贡院、兴学校、祭祀先贤、教化百姓作为先务。退休官员、乡绅、学者和塾师,这些地方精英都积极参与到宣传教育中去。他们或制订各种乡民约规范人的道德行为,或通过学校授课传播理学思想,或撰写治家格言、庭训对普通民众进行思想教育。对于少年儿童的教育,则有如《千字文》《三字经》一类的启蒙读物。甚至在南戏和话本小说里也不乏忠、孝、仁、义的故事,使田父野老在喜闻乐见中受到教育。

此时,松阳古代教育的体系已经建构成型,开始趋于完备。如县学中学生和教师的择取、学业的评定、升迁、管理,学生的生活保障和教师的报酬,教学内容和方式方法等,已经有一整套较为完整的制度体系来施行和保障。在私学方面,大致也是如此。因而,这一时期的松阳教育迎来了第一次全面发展的兴盛期。这一时期,在松阳的历史上,完全可以用群星璀璨来形容。在此后的古代松阳教育史上,再无此局面出现。究其原因,还有以下两点值得注意。

其一,南宋赵宋一家一直秉承重文的基本国策,其社会相对开放,其思想相对自由。因而官学私学中,有更大的学术辩论空间让他们抒发各自不同的观点,可谓百家争鸣。这容易让当时的学生教师有更多的学习和思考的热情,

从而促进了教育文化的发展。

理学至尊朱熹,初时皇帝和朝廷都厌恶他的理学,即便在如此形势下,他还可以传播自己的学说。赋闲在家时就办私学授徒,在中央和地方任职也往往带着学生,担任地方官则经常到辖下学校访问学政,登台讲学,一生都在不停地从事传播理学的教育和著述工作。宋淳熙九年(1182),朱熹甚至到松阳、缙云等丽水各县讲学。其带动效应毋庸置疑。

再如在教育理论方面,当时浙江就出现了三个有代表性的学派,他们分别是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,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和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。后人合称为“浙学”。他们既是当时社会开放的硕果,又反过来有力地促进了地方教育文化的发展。况且,这些当时最为先进的思想文化,距离松阳是如此之近,这应该是那个时代松阳学子的幸事。

这里还必须提及松阳女词人张玉娘(1250~1276)。北宋时期,官学是拒绝女子入学的。但到南宋时,私学可能就出现了女生的身影。曾有史载处州富人林五郎请秀才为独女素姐教读之事。张玉娘被后世推为宋代“四大女词人”之一,她的成就也说明当时有机会在私塾学习的女子不会是个别人。而这也可见南宋社会的开放程度和地方教育发展的概貌。

其二,宋代以来,全国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中心逐渐南移,由黄河流域移向长江流域。伴随着大量人口迁入和先进文化的进入,江南的社会经济文化得以迅速发展。但这对于松阳这样的偏僻小县,情况会更复杂些。

一方面,松阳周围大山的阻隔、交通的艰难,使得人口的迁入变得十分困难,因而人口的流入应该是一个长远而又缓慢的过程。但大山也同时把战争与纷扰挡在外面,使得松阳相对更为和平安宁,成为避祸的好去处。另一方面,松阳中部的松古盆地自然条件极为优越,十分适宜人们耕作居住。因此,古代松阳胜似世外桃源,对外人有很强的吸引力,一些有眼光者往往“来而不住”。北宋末年状元沈晦,建炎三年(1129)知处州时,卜居松阳上方山,其沈家血脉便得以在松阳生息繁衍。如此高素质的人才“引进”,深刻而长远地影响着松阳的教育。可以说,人口的迁入是促进松阳社会和教育发展十分重要的因素。根据松阳现存的108个姓的谱牒记载,唐中后期的“安史之乱”“黄巾起义”造成战乱地区百姓南迁,迁入松阳的有高、周、程、徐、潘、陈、纪等姓氏;南宋高宗南渡时,迁入松阳定居的有王、洪、翁、杨、沈、丁、毛、吴、刘、孟、项、詹、郑、包、何、江、萧、金、季等姓氏。

由此可见,宋代松阳教育在经过几百年的沉淀后,终于走上兴盛,并且在南宋时期达到鼎盛,此后元明清时代,再也未能超越。

(郑莉瑛、洪关旺整理)